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基于比较视角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周 文^{a,b}, 杨正源^a

(复旦大学 a.马克思主义研究院;b.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在传统西方与非西方的简单二分法下,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预设,即西方现代化源于市场化改革,中国近代的落后源于政府的过度管制,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但是,历史的真相却是开放而无管制的自由市场并不会带来国家崛起。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阶段,同样是依靠国家干预方式扶持幼稚产业实现现代化;而当前西方现代化的治理危机正是源于国家缺位,从而造成愈发严峻的贫富分化与持续扩张的金融资本主义。拉美困境与东欧剧变也再次证明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能实现国家富强,而东亚后发国家以强政府成功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在于超越和颠覆了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推动构建了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应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将百年来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更好地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崛起与发达国家改革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政府与市场关系;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F0;F1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3)11-0097-12

一、引言

始于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启动了现代化的引擎,使得亿万人摆脱了物质匮乏。但同样的工业革命,也使得英国以及稍后的西北欧和北美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分化开来,并制造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巨大的至今仍未消弭的鸿沟。这被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称为“大分流”。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某些国家之间的这一巨大分化?哪些因素在阻碍贫困国家追赶富裕国家?

长久以来,学界关于“大分流”这一议题争议不断,各种理论解释竞相争鸣。学者们关注到地理自然优势、既有经济基础以及历史制度的长期影响等各类因素的作用。首先开启“大分流”这

一讨论的是历史学家彭慕兰。他认为英国摆脱生态约束的困境并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型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殖民掠夺和易于开采运输的煤矿这两个外部因素^{[1]53}。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的学者们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保护私人产权、有限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西欧国家和近代中国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西欧众多相互竞争的小国的并立和近代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之间的对比。

信奉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本质上只是将国家视为一种功能性存在,是给工业化带来好秩序或坏制度的外生因素,其作用仅在于为私人资本搭建了适宜的活动舞台。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共识”认为:相对于欧洲,近代中国处于政府的集权管制之下,封建专制统治阻断了市场的自然发展,进而扼杀了资本主义的萌芽^[2]。西欧众多小国之间的竞争使得每一个国家都积极寻求改进自己的技术和军事组织,国家充满变革的活力。此外,为了获取民众和精英的支持,国家实行较低的税收,保护私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性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23ZDA030)

作者简介:周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正源,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人产权,这为西欧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而近代中国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则在抑制这些条件,两者的差异造成了东西方发展的差异。

然而,这样的解释似乎低估了西欧国家之外的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同时忽视了近代中国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就。事实上,在市场方面,整个18世纪,中国的贸易和市场发展水平与自由贸易程度即使不是优于欧洲,也至少和欧洲大致相当^{[3]117}。这一时期,仅以苏、松二府为限,江南每年进入长程贸易的商品棉布约为7000万匹^{[4]29}。江南棉布的销路不仅覆盖全国,而且还开拓了海外市场,向日本、朝鲜和南洋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运销。珠三角、长三角桑蚕丝业专业化水平很高。商人长途搬运粮食来往一千多公里,运行效率很高,比同期的法国、英国、美国市场更为有效^{[5]62}。

目前,虽然全世界已进入现代化的均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是不能将西方现代化的现象与事实直接等同于现代化的历史本质^[6]。在“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预设下,欧美发达国家相较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必然的且持久的。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即扩大资本积累,进行市场化改革,单一复制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但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时,西方现代化理论却出现了理论和现实不能互恰的现象。政府与市场关系二元对立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完全市场化最终导向市场原教旨主义,使市场缺乏有效监管,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加剧了全球范围内南北国家以及不同国家内部之间的贫富分化。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每一个时代都要编写他自己的历史。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今天仍然固守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西方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总结和探索现代化之路,需要打破现代化的西方迷思。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经济探索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实践中把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经验与教训。因此,我们需要在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对中西现

代化进行比较分析。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创造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7]497}。本文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重新审视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现代化模式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为严谨地分析国家在这一系列历史时期以及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本文试图证明,开放而无管制的自由市场并不会带来国家崛起。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和调适“国家成长”与现代化“社会转型”之间的张力中构建起的重要逻辑谱系^[8]。只有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为中国式现代化带来制度活力。

二、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角色:事实、真相与问题

(一) 国家驱动的成功转型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在对后发国家鼓吹“华盛顿共识”的通用性,并以自身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型。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各国发展经验时,就不得不承认国家对经济和市场的介入广泛存在于过去与现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发达国家。

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起步阶段,它们同样是依靠关税保护、出口退税、政策补贴、政府投资等政府干预方式扶持幼稚产业。维斯与霍尔森在《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一书中写道:“一般说来,国家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崛起并驾齐驱。国家的事务和资本主义的事务不可分割,它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面。”^{[9]43}19世纪初期,能让英国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标志,就是它当年无与伦比地开拓和垄断世界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的国家能力^{[10]84}。无独有偶,美国首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同样将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作为他的施政理想,并希望一个强大的政府能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支撑。因此经济史学家艾伦在深入分析历史上的美国在制造业发展方面的成就后,认为如果没有关税保护,南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就不可能引导美

国走向工业革命^{[11]80}。同样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出场,以德国为代表的其他西欧国家在面对英国强大竞争时不可能快速实现现代化。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其著名的工业化类型学中将其视为“适度落后”的国家追赶工业领先国的经典案例。国家在德国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从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到后来的施穆勒和桑巴特,均注重国家对于生产力提高的有力推动作用,因此这成为讨论德国工业化的一个元问题。经济史学家理查德·蒂利等在其最新著作《从旧制度到工业国:从18世纪到1914年的德国工业化史》中指出:“阿西莫格鲁等人将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构成经济增长的制度前提。但这一解释掩盖了普鲁士公务员官僚机构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正是在18世纪,普鲁士出现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政府。而且事实证明,这一政府在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强烈反对下,建立起来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12]146} 打造国内大市场是通往良性自由贸易的第一步。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德意志邦国里的分权与自治力量,实际上维护的是一种包括封建垄断的专制体制,恰恰是普鲁士这样有强大中央官僚机构的国家,扫清了建立国内大市场的各种障碍,推进了市场的统一与自由,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搭建了有利的制度框架。

实际上,自由市场并不会天然实现经济增长和百姓富裕,其背后是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在缺乏规制的市场中往往会出现巨大的两极分化和不公平交易^{[13]161}。没有哪个国家仅靠开放对外贸易和投资就得以发展,贸易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成功国家的秘诀在于,把国际场所提供的机会同国内投资以及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从而激发本国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力^{[14]203}。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自由市场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两者都需要国家力量来建设、保护、培育和强化,但这正是落后农业国家所欠缺的。只有在充分的监管之下,市场才能良好地发挥其创造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如果模仿越容易,就越会削减企业家“自主发现”的回报,创新活动发生的频率也会随之下降。

(二) 西方现代化的治理危机源于国家缺位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复杂进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工业革命引发的生产方式、劳动组织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欧洲人口向北美、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迁移,同时形成大规模的资本输出、掠夺殖民地,世界市场也随之扩大。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回退”成为西方国家治理的信条,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过程中都坚持消解国家权威的逻辑。将曾经的公共产业私有化,以及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战略的标志。当前,发达国家资本为最大程度占有剩余劳动价值、不断打破地域和主权国家界限走向全球,对相对落后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强势占有和剥夺,加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两极分化。不同的国家发展现状在本质上反映和体现着不同类型的国家治理模式的不同结果,当前西方国家在治理实践上的失败,正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足造成的^[15]。

1. 贫富分化愈发严峻。卢梭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指出,在人类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过渡过程中,不平等有了自然与制度之分,后者是由私有制造成的^{[16]35}。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通过放松金融管制、资本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扩大经济精英阶层的权力,持续维护资本食利市场,造成社会不平等加剧、财富差距加大。

从国家内部来看,以美国为例,美国既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西方国家。自1980年以来,纳税额处在后90%的人群,其扣除通胀之后的税前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0.1%,在28年间的总增长率只有1.9%。与之呈强烈对比的是,处在前1%收入的纳税人,其税前收入增长了2.35倍。美联储关于家庭财富的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总财富达到创纪录的45.9万亿美元,占全社会总财富的比例已达到创纪录的32.3%。^①即使是所谓欧

^① 数据来源于新华社:《美国贫富分化持续恶化的事实真相》。

洲福利国家,同样也承受着贫富分化的苦果。被西方媒体一直鼓吹的福利国家政策其实质是西方制度陷阱下的高福利陷阱。正如《剑桥欧洲经济史》中指出的:“工业家在工业革命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作安全、工资的限度、工人的教育和保险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二者鸿沟在相应地日益扩大。”^[17]¹⁶

作为资本的无限增殖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一方面,资本逻辑下的民主政治诱使执政党将福利更会优先覆盖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企业家、官员等小部分群体,以赢得选举^[18];另一方面,高福利的背后是高税收,西方国家将从广大民众那里剥削所得的剩余价值通过社会福利形式部分返还,以持续不断地剥削累积剩余价值。大多公民对于政治的关注只剩下如何让财政之手远离他们的口袋^[19]⁵⁸,深刻表明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产生了个体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矛盾^[20]。

就全球范围看,不同经济体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其将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对高额利润的攫取。无论是早期的对外贸易、殖民统治,还是当下盛行的资本输出、金融垄断和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为了从他国获得高额利润。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在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时,总会附带上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方面的条件,谋求实现最大化利益。伊拉克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从本国地下开采出来的石油基本没有给伊拉克带来收益。1950年,当英国打算贷款给伊拉克用于修建和扩建铁路系统时,曾要求伊拉克将财政收入抵押给英国作为担保。如果伊拉克未能偿还贷款那么当地的油田就将由英国人接管^[21]³⁴⁹。

21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当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试图进行工业化改造时面临的不仅仅是关税、投资的劣势,还面临着技术积累薄弱的局面,发达国家除了以往的贸易关税、金融垄断手段外,还利用技术垄断来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阻断正常的技术转移。随着跨国互联网垄断巨头崛起,产品内分工网络

化发展迅猛,技术垄断成为新的垄断形式。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像微软、亚马逊和谷歌这样的信息巨头会通过信息优势来巩固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并将自己的市场势力渗透到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各个领域。由于这些企业在数据上占据绝对优势,竞争对手几乎没有进入市场的空间。”^[22]¹²⁸发达国家在具备技术优势下,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向发达国家支付大量的技术使用费,这些以低技能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在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下,技术和知识成了重要的生产资源,技术租金成为发达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2.金融资本主义持续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进程中,资本量的增加会带来利润量的增加,但同时也会造成利润率不断下降。”那么为了快速扭转这一下降趋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各类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下,只能对现有的资本增殖模式进行革新,放松金融管制的改革,把大量原本用于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本投入快速循环的金融领域,甘冒巨大风险,通过推高杠杆率、创新金融产品等形式博取资本增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的改革验证了列宁在20世纪早期作出的判断:“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23]³⁸实际上,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在这一过程中以物质生产资料为核心的工业资本积累日益让位于以信用为核心的金融资本积累。也就是说,正是经过了20世纪的转折和发展,资本才在21世纪获得了发挥其全面金融化本能的舞台和条件。金融市场高风险背后的高回报率天然对资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再加之仅靠资本循环完成快速增殖而不需要通过缓慢的工业积累实现回报,这本身就使得资本运动更倾向于通过投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处于竞争中的资本家更加倾向于把追加资本投入金融领域而不是购置工业设备,在扩大再生产中经济形态加速虚拟化、泡沫化,金融化在这一机制中形成。

金融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使得经济的宏观表

现与微观表现都发生了变化。在宏观上,金融化的包装正在取代其他活动,金融业的支配权逐渐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股票市场日益展现出其在商业周期中的重要作用。经济活动重心发生转移,金融部门的就业人数快速增长,金融活动日渐频繁,从以产业部门为中心转向以金融部门为中心。在微观层面上,企业逐渐强调“股东价值”,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这种财务管理目标的转变带来了公司管理层的压力,企业利润的来源在这一压力下发生了转移,为获得利息、股息和资本收益的资金活动日益取代商品生产与贸易活动,成为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和欧洲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像是精英阶层“妥协”的产物,监管层、经济学家和华尔街金融高管更像是“监守自盗”,腐朽的制度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前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等就此指出:“金融业比工业能够更快地创造价值和毁灭价值。例如金融衍生工具,就像炸药一样,在正确使用时非常有益,而落到无能或者不谨慎的人手里时,却能在瞬间造成巨大的损失。”^[24]¹¹⁵实际上,早在“次贷”危机前,美国金融衍生品规模就已大幅度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过剩的产业资本需要向金融资本转化来缓解物质生产过剩的压力。其实质就是通过金融自由化政策,让资本在全世界游走,再通过霸权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从而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热钱涌入美国的股市和楼市,这能维持其金融领域利润率,以支撑发达国家内部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的自我循环结构。

三、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争议与问题

(一)东欧剧变与拉美困境:休克疗法与政府缺位的教训

1990年1月1日,波兰率先开始实行激进的“休克疗法”,以此来全面启动经济转轨的进程。之后,其他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也争相效尤。激进的转轨使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仅用三五年的时间就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框架,但隐藏在其背后的高昂代价,如经济体制的真空、经济发展的严

重倒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等至今仍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难题。“休克疗法”在传入俄罗斯以前,在遏制通货膨胀、稳定宏观经济方面本来是颇有疗效的,但它在传入俄罗斯之后却适得其反,全然不顾具体国情,主观武断地一笔抹杀其历史遗产,出笼了一套快速和激烈的干预措施,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同样,在开始施行“休克疗法”的1990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1.6%,工业产值下降了24%,1990—1991年两年的工业产值则下降了近40%,当时被认为是战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的巨大的生产衰退”^[25]²⁶²。

伴随着“休克疗法”而来的是全方位的私有化。各国都把私有化视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其最终目标是要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改造成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为了过分追求速度,加之缺乏社会监督和暗箱操作,私有化实质上成为利益集团和掌握着各种资源的有组织角色的博弈场^[26]²。巴富瓦尔就此指出:“东欧各国的私有化进程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在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英国,花了八年时间才使占国内生产总值4.5%的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而在这些东欧国家,仅用了不足十年的时间,就使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由过去的95%左右下降到30%~50%左右,并使私营经济产值所占的比重从转轨前的平均不足10%发展到60%~70%。”^[27]³⁷⁵匈牙利在私有化过程中将国有企业大部分卖给了西方财团,只有18%的国有资产被国人买走。西方投资者不仅购买了匈牙利的工商业,而且买走很大一部分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工业、石油工业、银行和通信企业等,为西方财团干预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提供了条件。

类似地,作为昔日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带有典型的“悲剧色彩”。对于这些身处殖民半殖民统治的国家而言,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工业化的启动就更为艰难。作为南美重要的国家,阿根廷和巴西近些年来一直陷入经济发展

泥潭之中不能自拔。但在历史上阿根廷和巴西均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宣传的模范生,一直照搬西方治理体系。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相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照搬了欧美体制,全面推行完全市场,丧失了自身经济主权。阿根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国土面积近300万平方千米,东濒大西洋,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均可耕地面积是美国的将近2倍,海产品、森林、淡水等自然资源也无比丰富。而巴西同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着丰富的矿产、石油以及水资源。这两个南美重要国家就是由于政局不稳,政府作为有限,政策制定和制度变迁就如“钟摆”一样摇摆不定,自由市场主义和民粹主义频繁交替。随着执政党把“华盛顿共识”奉为圭臬,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西方资本大举进入,把南美国家的国有企业和重要矿产资源据为己有,经济发展也随之失去了自主权。这再一次证明了没有强大的国家建构,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市场化改革的失败已经表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也并不是“绝对真理”。在实践的基础上,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完全市场化改革的适用性。丹尼尔·耶金认为:“市场无法与一个失灵的国家协同工作,这将迫使拉美各国重新发现国家的作用。”^{[28]367}爱泼斯坦也指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公共产品,是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的产物。对这个公共产品的供给来说,一个以集权的财政体制为基础的国家主权是十分必要的^{[29]2}。拉美的一些左翼学者也开始探讨西方现代化在拉丁美洲的实践局限性。劳尔·普雷维什在深入分析拉美国家惨遭发达国家经济剥削和危机转嫁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尖锐批判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拉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都表现出了与发达国家共振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力,不断从半边缘和外围国家中获取以农业为基础的产品以及原材料,将发展中国家牢牢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从而维持了自身的优势地位,充分证明了拉美经济对发达工业国家的依附性。

(二)东亚后发国家现代化:“强政府”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冲击

如果说近代欧洲的经济的发展主要为私人企业家的冒险行为以及包括市场、合约、私产和资本交易等制度所推动,那么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现象均离不开国家在发展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东亚后发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崛起,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高度工业化和技术先进的现代社会的跨越。与西方现代化的典型路径不同,东亚国家普遍采取了强调政府主导的策略。“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30]131}。它表明,现代化的途径并非固定不变,不同的国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策略。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政府缺位”或者“政府不干预”,而是需要有针对性地参与和引导。

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报告中认为,产业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干预手段。由于技术创新通常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与外部性,只有政府提供了足够的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新成果才不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或侵犯,创新活动才能够顺利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商业价值。这种东亚后发国家的成功现代化经验对传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当今任何企业的运营都离不开国家提供基本服务。政府不仅在决定创新的速度,而且在决定创新的方向上发挥着重要作用^{[31]136}。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的钢铁、煤炭等资源。电力、船舶、煤炭、钢铁便成为通产省指定的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通产省采取保护幼稚产业的干预法,通过限制准入、限制竞争来扶持企业做大、迅速扩张产能。《机械工业振兴法》《电子工业振兴法》等法案相继公布。1959—1970年,日本年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高达11.3%。到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跃居西方国家的第二位^{[32]2}。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通产省对本国产业的扶持从过去的钢铁、化工、机械制

造转向电子、集成电路、核能、飞机等尖端技术。2014年6月,日本颁布了《制造业白皮书》,明确提出对制造业结构进行调整,将机器人、3D打印技术、清洁能源汽车等高技术产业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重点领域。韩国作为一个国土面积有限、资源匮乏的国家,也正是在政府关税保护、进口限制和财政支持等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引导下,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快速推动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不断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再向电子工业和高技术工业转型。当然,韩国过度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实施了长期信贷优惠利率,短期内虽然帮助战略性工业部门解决了资金问题,但造成了日后大型企业的超高负债率问题以及严重的财阀垄断现象^[33]。1995年,韩国41%的工业增加值和16%的GDP集中在前30家财团手中。

(三)苏联式现代化: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为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阵营,体现社会主义优势,苏联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由中央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来推进的。苏联将全部资金集中于某些目标,避免将资金分散使用于无助于实现迅速工业化的其他目标上。因此苏联早期发展阶段制定计划的特点是,根据中央确定的轻重缓急顺序对资金实行行政管理和行政分配,市场全面被政府的计划取代^[34]。

应当承认,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在战时和准战时情况下显示出了它的适应能力和优越性。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是,便于集中全国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服务于特定的目的。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国有化和计划的指令性。首先,国家机关是经济管理的主体。它既是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直接经营管理者。企业只是计划执行单位,必须无条件完成国家计划任务,没有经营自主权。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是“指令性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执行”的计划。这种计划能决定全国经济“将来发展的方向”。随着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确立,市场和市场调节作用被彻底否定。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一度被人们看作

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

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能抵挡资本主义的挑战,其固有的弊病不易显现。但是,当特殊的历史条件消失,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工业部门交叉林立,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经济联系日趋复杂时,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则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日益凸显。突出的弊病就是: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片面发展重工业等。

在工业化时期,列宁和斯大林都曾指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相互依赖性,阐明了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要性。但二战后,当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以后,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则从主观上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全世界市场上、从世界经济中分割出去,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脱离世界经济而孤立进行。这就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僵化,经济和科技发展滞后于世界前沿^[35]²³。马克思早就认识到了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成果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他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具有先进制度的国家的文明成果来发展自身,而制度超前的国家也能运用现有的文明成果弥补不足。

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基于线性思维和公式推导的新旧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塑以及现代化模式的新动向。时代呼唤经济学理论创新,如何将百年来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仍然需要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出发。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经济学的世界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吸收借鉴了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同时,也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思想宝库贡献了丰硕成果^[36]。

(一)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建构

正如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所概括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的进程。”^[37]⁴从横向来看，弗里斯认为国家建构往往与国家经济的发展齐头并进。中国清代时期，即使存在某些形式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建设力度也相当薄弱。欧洲国家的崛起依靠的是政府主导下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战略的相机抉择或合理混用^[38]⁵³³。而从纵向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能力锁定明显不适应新的产业与技术和新的财政与司法制度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也不能很好地吸收工业国家的技术扩散^[39]。

因此，近代中国的落后并不是因为商品经济不充分，主要是清政府既不能兑现民众的福利，也无力抵御外来的侵扰，更没有引导变革的力量，是在国家建构方面出现了大的问题，这才是中华民族到了近代逐步衰弱的根本原因^[40]。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展现出政府合理调控市场经济的案例。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学派的“轻重论”主张政府应当积极干预和调控重要的经济活动，如农业、税收和商业等。北宋王安石借鉴桑弘羊的平准法，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于汴京颁布实施“市易法”，旨在减轻市场税收负担、平价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从而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等。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二) 中国式现代化：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实现国家富强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国家现代化不同的发展道路。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也经历了“政府放开市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约束政府”——“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阶段变迁。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指出，建成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实现了我国的现代化^[41]⁹。因此，可以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辩证法”恰恰是中国特色国家建构的生动体现。

不论是“低端锁定”陷阱，还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两难，实质上都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之中市场与政府的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钟摆式运动。经济平稳运行时的国内自由放任主张与国际自由贸易政策，经济危机时的国内政府临时干预和国际贸易保护转向，国际机构也常常被发达国家操控，而又因组织松散没有一个真正稳定的全球化调节机制。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之所以将政府与市场相对立，是因为西方相信市场的“无所不能”，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自动调节生产，自动创造需求。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的表现。为此，就要实现彻底的、私有的、自由的市场化经济模式。但是经济史学大师卡尔·波兰尼已经尖锐地指出，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42]¹²⁸。

现实世界的历史已经对市场化改革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但是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同样作为劳动力资源禀赋丰富的人口大国，印度在1991年就开始了更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然而基本整个90年代，中国的GDP增长率都远高于印度^[43]⁸⁹。因此，二元对立的思想并不是从根本上构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方。尽管西方国家在现实层面常常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甚至政府的作用十分关键，但从根本上讲，西方经济学并未摆脱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零和思维模式，仍然是从强弱、大小来定义政府与市场关系。并且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经济学都是建立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存在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未能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较之前缓慢，危机发生较之前更

为频繁?奥戴德·盖勒在其著作中给出了一个可信的解释:“旨在帮助贫困国家的政策在设计中过于关注表面上可观测的因素即显而易见的差距,而忽略了导致差距的根本原因(根植于国家内部的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多样性和凝聚力等深层次的影响因素),从而难以克服那些更顽固的不可见障碍。”^[44]¹²³

市场经济模式没有统一答案,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唯一模板。相比于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同时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积极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经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依然存在规制不一、区域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和不合理垄断等问题,更加需要政府以高效的治理能力来破解这些难题。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超越了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探索出了一条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政府、市场的“三维谱系”^[45]。

具体来看,在战略性支柱领域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军工装备、前沿核心技术、能源、粮食等领域,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国家产业安全、国防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在诸如公路、铁路、电力等公共服务提供领域,由于其作为准公共物品所具有的福利性质,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在一般性资源配置领域,应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辅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

(三)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对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物质生产的主要支柱。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历次经济危机也反复证明了靠虚拟经济发展可以收获金融财富,但实现

不了现代化,所产生的只能是经济泡沫。凡是不注重实体经济,尤其是不重视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国家,必将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发展陷阱。

2008年金融危机长尾阴影叠加2020年新冠疫情的深远影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随着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创新需要资金充足的公共研发机制以及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国家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46]。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需要长期积累,难以快速看见应用成效,难以基于市场规律来发展。这类大科学研究和大量基础研究所需投入的资源和组织力度越来越大,远非一般社会组织或个人所能驾驭。

当前,完全由党和国家调控创新资源的传统举国体制或完全放任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张都无法满足我国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迫切需要。因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果说只要依靠市场规律的自发运转就可以发挥资源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实现增长,相较之下构建起具有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更需要政府主动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卡脖子”领域产业的创新和追赶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协同的新型举国体制^[47]。在“有为政府”的一面,它需要继承传统举国体制由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核心特点——聚焦于特定产业、目标明确且由政府专设统筹协调机构、多方调度大量资源。在“有效市场”的一面,它要发挥市场在塑造产业、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资本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但倘若不给资本设置“红绿灯”,不给资本制定行动的边界,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各类资本就会无序扩张、野蛮生长,为现代化经济建设带来种种负面影响。雅各布斯和马祖卡托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下不受监管的金融资本越来越投机,越来越偏离生产投资。直到股票市场的虚拟经济脱离商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远远偏离它们所代表的公司的业绩。”^[48]²⁷¹资本的积累性、扩张性与盲目性,叠加资本的证券化、虚拟化和金

融化趋势,在经济上表现为寡头垄断与垄断竞争,同时不断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益性领域扩张。数字经济平台化趋势是世界经济资本扩张在全球产业链基础上,进一步整合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社会化扩大再生产新发展形势。部分平台垄断企业通过实施虚假促销、捆绑交易、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行为,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其规模效应不断降低平均成本,使边际成本逐渐趋于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形成“赢家通吃”的行业格局^[49]。

正是有赖于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战略定力,较好把握了金融开放的尺度,中国才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避免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的复苏创造了有利的环境。面对着当下过度金融化可能会带给实体经济的危害,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到化解金融方面的风险时也强调,“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牢牢树立金融为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基本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成果。2015年起,监管部门开始推出一系列监管措施。作为原银保监会金融监管体系的“升级改造”,以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设立为重要抓手,加大力度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坚决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厘清责任边界,真正实现监管“全覆盖、无例外”。

(四)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

二战后,美国学者提出“冲击—反应”范式,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反应。但是,历史上欧洲的崛起既是一场激烈的政治经济竞争,同时也是一场历史解释权的竞争。历史被扭曲、被利用,人们选择性地引用史料,编成了个随着时间推移越发让人觉得可信、越发被认为是标准的故事。最终制造出一种假象,似乎西方的崛起不仅是自然天成、无法避免,而且是由来已久、顺势延绵^[21]⁶。就现代化说,这显然是一种“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假说^[41]⁶。

历史的经验表明,每一个时代占据主要话语

权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就是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经济学,并且拥有经济学话语权的国家往往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一思潮在经济学上的表现就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主要肩负着两大任务:一是形成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为资本主义长治久安提供理论武器;二是结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经验,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和资本垄断集团出谋划策。但一系列的事实深刻表明,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既不能解释真实世界变化,也无能为力为乏力的世界经济开出药方。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直接目的就是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为当今时代一个国家的话语权代表了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我国经济历经世所罕见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2020年,世界经济遭遇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发达或发展中国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经济纷纷出现败落,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再次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过去中国贫穷落后,不可能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没有经济学的话语权作学理支撑的经济不可能走得更远。自经济学成为系统性学说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世界各个学派学者争议的一个重要话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国既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也不机械地对标西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50]。

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故事,需要依靠中国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扎根中国大地的系统化最新现代化理论,凝结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在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积累的经济智慧与理性思辨同样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具有丰富内涵的传统经济思想体系。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保持

延绵不断的文明,蕴含着更为丰富的经济学元素。因此,更加需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抽象、提炼出更具世界意义的一般性经济理论,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更好地提高其国际影响力,让现代化的中国理论走向世界。

五、结语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积累的巨物质财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驱动下,一时占据上风。发展中国家在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处于受支配、依附和脆弱的地位,其理论与实践经验被边缘化。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作为笼罩着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阴影,给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打上了大大的问号。然而,当下西方国家在波浪式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中苦苦挣扎,对自身的固有矛盾和制度缺陷也无力解决。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态势,传统简单的“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主流—非主流”的二分法已不再适用,世界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从世界历史视角综合透视百年现代化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成功经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发展,中国已逐渐从近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主体转变为新型世界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与建构者,以更加开放的举措面对世界,并以更加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多元书写中,更好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抢占先机,也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崛起与发达国家改革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黄中宪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1 年版。
- [2] 周文、李超:《中国奇迹何以发生:基于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经济学动态》2022 年第 11 期。
- [3] 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 [4]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5]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 [6] 项久雨:《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优势》,《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5 期。
- [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 [8] 姬超:《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成长逻辑及其世界意蕴》,《人文杂志》2023 年第 4 期。
- [9] 维斯、霍尔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廖志强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09 年版。
- [10]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 [11] 罗伯特·C.艾伦:《全球经济史》,陆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5 年版。
- [12] 理查德·蒂利、米夏埃尔·科普西迪斯:《从旧制度到工业国:从 18 世纪到 1914 年的德国工业化史》,王浩强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22 年版。
- [13] 威廉·伊斯特利:《经济增长的迷雾:经济学家的发展政策为何失败》,姜世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 [14] 丹尼·罗德里克:《一种经济学,多种药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张军扩、侯永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
- [15] 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
- [16] 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邓冰艳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 [17] 彼得·马赛厄斯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王宏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18] 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兼论对西方福利国家理论的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0 期。
- [19]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郭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 年版。
- [20] 周文、杨正源:《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 年第 3 期。
- [21]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 [22]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

- 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刘斌夫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 年版。
- [23]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 [24] 拉古拉迈·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
- [25] 王正泉：《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1989—1999）》，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
- [2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热拉尔·罗兰：《私有化：成功与失败》，卢昌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 [27]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欧洲化》，陆象淦、王淑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 [28] 丹尼尔·耶金：《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段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0 年版。
- [29] 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 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宋丙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 [30] 兰小欢：《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 [31] 迈克尔·雅各布斯、玛丽安娜·马祖卡托：《重思资本主义：实现持续性、包容性增长的经济与政策》，李磊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
- [32] 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金毅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10 年版。
- [33] 付建军：《从发展型国家治理到平衡型国家治理：韩国国家治理转型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研究》2015 年第 5 期。
- [34] 陈健、郭冠清：《政府与市场：落后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比较》，《齐鲁学刊》2018 年第 1 期。
- [35] 马凯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 [36] 周文：《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经济研究》2016 年第 3 期。
- [37]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郭大力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 [38] 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和中国》，郭金兴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
- [39] 付敏杰：《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理论假说和中国事实》，《学习与探索》2018 年第 11 期。
- [40] 周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邓小平研究》2020 年第 2 期。
- [41]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 [42]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 [43] 谢富胜：《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 [44] 奥戴德·盖勒：《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22 年版。
- [45] 周文、司婧雯：《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海经济研究》2022 年第 1 期。
- [46] 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3 年第 15 期。
- [47] 周文、李吉良：《新型举国体制与中国式现代化》，《经济问题探索》2023 年第 6 期。
- [48] 迈克尔·雅各布斯、玛丽安娜·马祖卡托：《重思资本主义：实现持续性、包容性增长的经济与政策》，李磊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
- [49] 周文、韩文龙：《平台经济发展再审视：垄断与数字税新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
- [50] 周文：《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江汉论坛》2023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曾 博]